

# 古诗文中有关成都故实的几点考证

岳 生

**内容提要** 唐宋时期盛兴浣花溪春游,两代诗文对其正期的变换有记述,却未提及变换原因,本文第一部分作了试探性解释。第二部分借薛涛名篇《玩竹》辨证“元薛姻缘”、“郑薛夫妻”说不实,并从而认定薛涛矢志忠贞旧情人品高尚。《花蕊官词》作者属谁,因有北宋论者混同前蜀、后蜀花蕊夫人为一人,虽经两宋及明代论者的辨证,《全唐诗》、《全五代诗》仍将《官词》归属后蜀作品,本文第三部分就《官词》内证认定其作者应是前蜀人。

**关键词** 浣花遨头 冀国(浣花)夫人 校书郎 “元薛姻缘” “郑薛夫妻” 花蕊夫人 《花蕊官词》

## 一、“浣花遨头”故实辨析

唐宋时期,成都官民盛兴春游浣花溪,号为“浣花遨头”。

《词源》(修订本)“遨头”条释文作“宋代成都自正月至四月浣花,太守出游,士女纵观,称太守为遨头”,并引东坡诗、放翁文为据,“浣花”即据陆说省溪字;“遨头”指太守云云,两老均无此意。笔者疑“遨头”系指春游浣花溪的正期,是日,成都太守(尹)当必出游与民同乐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八:“四月十九日,成都谓之‘浣花遨头’,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。倾城皆出,锦绣夹道。自开岁宴游,至是而止,故最盛于他时。”<sup>[1]</sup>《分类东坡诗八·次韵刘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》:“蓝尾忽惊新火后,遨头要及浣花前。”<sup>[2]</sup>据苏诗语意,“遨头”应在寒食前,而陆文说是四月十九,两者日差达一个半月左右,何以有此歧异,殊堪玩味。

据初唐诗文记述,浣花溪春游已见于当时。成都尹(太守)出游始见于杜工部、岑嘉州诗,惟均在“早春”。杜诗《严中丞枉驾见过》:“元戎小队出郊垌,问柳寻花到草亭”;岑诗《早春陪崔中丞泛浣花溪》:“旌节临溪口,寒郊斗觉暄。……花间催秉烛,川上欲黄昏。”<sup>[3]</sup>有关景色又都不似正月十日,按茅以升教授论证的川中唐代物候推测,纵使盛唐年间成都平原气温较高,也当是正二月之际。专记唐宋时事的《岁华纪丽谱》云:“正月念八日,出笮桥门,即拜保寿侯祠,次诸净众寺,拜杜邠公祠。”<sup>[4]</sup>北宋成都太守田况亦有诗,题作《正月二十八日谒生禄祠游净众寺》,或可佐证杜、岑诗篇的早春,乃是正月二十八日<sup>[5]</sup>。

但是,田况又有《四月十九日泛浣花溪》诗。田况同时人,另一位成都太守宋祁《浣花泛舟》有“早夏清和在,晴江沿溯时”,也合于四月;诗中又有“雅俗西南盛”语,也表明系官民同乐。这些诗

篇，恰足证明放翁所说“浣花遨头”正期为四月十九。可是，宋祁偏偏又有《春日出浣花》，说是“暖风才满使君旗，……场雨灭尘盘马疾”。“春日”绝不是四月，“暖风”、“场雨”更不会发生于正月，倒颇近于苏轼所说的寒食稍前。

《词源》指称四月十九浣花溪系宋代事，可唐末即已如此，《蜀梼杌》载：“乾德五年四月十九日，王衍出游浣花溪，龙舟彩舫，十里绵亘，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，游人士女，珠翠夹岸。”《花间集》内，曾收录前蜀侍臣浣花春游词；《全唐诗》、《全五代诗》也收有前蜀君臣此类诗词。

从以上所举资料可知唐宋官民春游浣花溪，其盛期、正期，亦即“浣花遨头”，有正月十日、正月二十八日、寒食前和四月十九日，大抵可以看出从正月向后推移的痕迹。东坡对寒食游西湖表示应依从“浣花遨头”的在寒食前，即三月初，却不提出杜、岑诗所说的早春，初唐、盛唐的正月初十或二十八，是否别有依据呢？这或可从四个日期之外（或者说正月、四月之外）的另一日期的记述得到启发。晚出唐宋多年的《蜀志补遗》说是：“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人像，三月三日为夫人生辰，倾城出游”，这一孤证所记日期，正是在“寒食前”。补上此日期，就可看出“浣花遨头”由正月推移至三月，再推移至四月的流衍之迹。

《蜀志补遗》不仅有助于了解东坡寒食游西湖的有关语意，更重要的是有助于“浣花遨头”日期向后推移因由的索解。

《岁华纪丽谱》说正月念八日，拜保寿侯祠、杜邠公祠、净众寺；《老学庵笔记》说四月十九日宴杜甫草堂沧浪亭，虽都在浣花溪上，却各有偏重，日期更自不同。可见，正月，官民同乐于杜邠公祠等地；四月，官民同乐于杜甫草堂。对草堂之游，略早于《老学庵笔记》成书的《方輿胜览》别有记述：“梵安寺在成都县南，与杜甫草堂相接。每年四月中浣前一日，太守宴集于此。”宴于草堂沧浪亭和宴于梵安寺，实际上并无多大异同。据杜诗，亭在草堂园址东，东篱外隔古道即浣花溪；按唐宋时代资料及明代《四川成都府志·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》，可知“篱边水向城”近处即梵安寺<sup>[6]</sup>，故而亭、寺相接，宴此宴彼，很难区分，何况盛唐之后，人众春游浣花溪当有避忌，以致浣花遨头正期被推移，南宋人去盛唐为期已远，遂有宴于梵安寺的记载。

关于梵安寺的历史，《益部谈资》云：“武侯工部二祠之中，有寺，一名草堂，一名中寺，前代为尼居，名桃花寺。隋文帝时，始易以僧。唐大历中，崔宁镇蜀，以冀国夫人任氏本浣花女，遂重修之，绘夫人真于其中。会昌亦在毁例，夜闻女子啼泣之声而止。宋朝祷雨有验，乃赐名梵安寺。”<sup>[7]</sup>唐宋别有资料称系成都民众改建作夫人“生祠”。任氏事迹，载于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的《代宗本纪》、《崔宁列传》等部分，《资治通鉴·唐纪》也有记述。任氏封号，正史无明记，只云封国夫人，不及两年，崔宁即被代宗暗杀于金銮殿上御座侧，任氏如何处置，正史更无明文，但被削封号乃必然之事，或者民间因此而改称冀国夫人为浣花夫人。北宋名臣吴中复所撰《冀国夫人任氏碑记》，则仍举唐王朝正式封号。吴中复与苏洵为文字交，在蜀任犍为县令时，老泉曾自眉州买舟往访，留连一二月，东坡认为浣花遨头应在三月初，或即因吴撰碑记及任氏生辰而定<sup>[8]</sup>。

吴“碑”曾记有“夫人微时，以四月十九日见一僧坠污渠，为濯其衣，顷刻百花满潭，因名百花潭”。任氏率民兵击败叛将泸州刺史杨子琳后，神僧助阵事传说甚广，直至南宋仍未息止<sup>[9]</sup>。由此可见，四月十九日之说当同任氏有关。

依据上引诸书、诗、文，似乎可以推论浣花溪春游，原本在正月；因任氏保卫成都（及西川）得民众爱戴，延至三月初三为正期；又因崔宁被杀，任氏被削国夫人封号（而且极有可能“没官”），功臣与叛贼为代宗所颠倒<sup>[10]</sup>，官民不再敢于是日往谒任氏祠堂，遂改在四月十九日。这或许就是

“浣花遨头”推移的根由。

## 二、薛涛《玩竹》诗意探略

薛涛身前名重一时,成诗较多,或因其身世寒微,致随岁月流逝而散佚不少。据古籍记载,宋初原有《锦江集》五卷,南宋中期尚存五百余首,及至宋末便已不满百数,且以献酬、咏物绝句为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说:“涛《送友人》及《题竹郎庙》诗为向来传诵,然如《筹边楼》诗……托意深远,有鲁嫠不恤纬,漆室女坐啸之思,非寻常裙屐所及,宜其名重一时”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卷Ⅰ也说:“薛涛的诗,不仅如世所传诵的《送友人》、《题竹郎庙》等篇,以清词丽句见长,还有一些具有思想深度的关怀现实的作品,在封建时代的妇女,特别是像她这一类型的妇女中,是不可多得的。”两书均据中唐人说薛涛身列乐籍为营妓,“这一类的妇女”即指此。

四库馆臣、大百科全书编撰人均同于与薛相唱和的诗家,以及晚唐以后的历代论者,集中肯定其“工为诗”,并归之于“清奇雅正”一类<sup>[11]</sup>。可是,当今的薛涛研究家——特别是四川的研究家所专注者,多半在其诗才之外,或津津乐道“元薛姻缘”、“郑薛夫妻”,或力辨其非乐妓,乃是王朝校书郎。元薛事出自《云溪友议》,宋朝人即证其失实;郑薛事则纯属无中生有。虽然近人均为之撰有专著行世,然皆毋庸置议<sup>[12]</sup>。韦皋(或武元衡)拟授薛涛校书郎事,见书极多,如《鉴戒录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笺纸谱》等均为行世名著,并世大诗人王建赠薛诗亦题《寄蜀中薛涛校书》,但却因“格于旧例,未能实现”(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语,所据即《鉴戒录》等书)。所谓“旧例”,指的是校书郎系唐王朝正式官职,应由朝廷任命,薛涛无缘受任。按:校书郎为秘书省、集贤殿属官,例授博学之士,多不过八名。节度使府虽可设置,也必报请朝廷表授,南康郡王韦皋的请授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府校书郎,即为著例,载于两《唐书》段文昌本传。封疆大吏的子侄假此职称任事,如韦正贯,段成式,或亦不例外,也可能“韦校书”。“段校书”只是誉称。自王建至樊增祥,多以“校书”为薛涛雅称,从而他人又以之及予其他诗妓和妓女<sup>[13]</sup>。

历代评价薛涛诗作的文字,笔者以为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内篇》卷五最为中肯:“声诗盛于三唐,而女子传篇亦寡,今就一代计之,篇什最富,莫如李冶、薛涛、鱼玄机三人,其他莫能并焉。是知女冠坊妓,多文因酬接之繁;礼法名门,篇简自非仪之戒。此亦其明征矣。夫倾域名妓,屡接名流,酬答诗章,其命意也,兼具夫妻朋友,可谓善借词矣。……名妓工诗,亦通古义,转以男女慕悦之实,托于诗人温厚之词,故其遣言,雅而有则,真而不秽。流传千载,得耀简编,不能以人废也。”章氏此议,清末成都刻本《宏度集》首列《酬人雨后玩竹》最足体现。陈矩序“集”有云:“惜《通志》所载涛诗寥寥,而后人但知咏桐之作,不知开卷《雨后玩竹》一诗,何啻涛自写照。”

现录全诗如次:

南天春雨时,那鉴雪霜姿。众类亦云茂,虚心宁自持。多留晋贤醉,早伴舜妃悲。晚岁君能赏,苍苍劲节奇!

这是一首前半同于古体格调的小律,其体式多见于初唐、盛唐。本诗破题和结语,皆以老竹自况,结语兼颂所酬之“人”能赏其“劲节”;颌联颈联均谈身世,亦均涉竹故实,极其贴切。缘其充分体现出薛涛的诗才与工力,不仅词清句丽,也能自由驰骋于众多故实之中,驱为己用,这在涛集中屡见不鲜,宜其深受中唐诗坛翘楚的赏识敬重,引为诗友。这又正属涛虽身在乐籍,而又能洁身自好的凭借。

《玩竹》通篇的“不啻自留照，还应结合薛涛现存多首诗作考查，方更能体认出伊矢志情爱于“远人一友人”（《赠远》、《送友人》）的“了不起”。破题表明随侍达官显宦宴饮游乐的迫不获已，意同《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》、《酬文使君》等诗。颌联也同于《赋早菊》的“自有兼材用，哪同众草芳”；《金灯花》的“阑边不见蓂蓂叶，砌下惟翻艳艳丛”。颈联乃题眼，虽说不得不侑酒；却只止于此，因绝不忘情于由陇西“飞来飞去上锦茵”、“朝去暮飞还”的远人。在此之前，《十离诗》、《送友人》、《罚赴边》（四首），表现出涛为远人不畏权贵，不避艰险。《江边》、《蝉》、《寄词》、《送郑眉州》、《送卢员外》、《春望》等等，皆反映出涛的长怀旧情。《别李郎中》，则是死别也自不改本愿<sup>[14]</sup>。直面如此坚贞于远人的乐妓，这位相偕于雨后玩竹者，焉得不赞赏“苍苍劲节奇”！结语既委婉地表达了自持的意志，又真挚地称颂了这人对自己的尊重。“清奇雅正”，“得耀简编”，《酬人雨后玩竹》正足以为代表<sup>[15]</sup>。

### 三、花蕊《宫词》作者考证
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，就内证考查，应是王建妃撰作。

释文莹《续湘山野录》记载：“王平甫安国奉诏定蜀民、楚民、秦民三家所献书可入三馆者，令令史李希颜料理之。其书多剥脱，而二诗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，笔书乃花蕊手写，而其词甚奇，与王建《宫词》无异。建之词，自唐至今，诵者不绝口，而此独遗弃不见取，受诏定三家书者，又斥去之，甚为可惜也。遂令令史郭祥缮写入三馆。既归，口诵数篇与荆公，荆公明日于中书语及之，而禹玉相公、当世参政愿传其本，于是盛行于时。文莹亲于平甫处得副本，凡三十二章。”但未指明诗作出于王蜀徐氏，抑或出于孟蜀费氏。由于唐末、五代时王蜀、孟蜀各有一花蕊夫人，兼以多误两者皆徐姓（如《十国春秋》等），遂归此诗作于孟蜀花蕊夫人。虽然《后山诗话》、《铁围山丛谈》曾辨正两花蕊姓氏各别，却仍以《宫词》归属孟蜀花蕊。其后，宋明人曾疑王蜀花蕊生于刺史家，孟蜀花蕊少年时选自山野农户，后者未必能诗，可《全唐诗》、《全五代诗》，直至《词源》（修订本），均称《宫词》作于后蜀费氏，仅李调元在《全五代诗》所载《宫词》注称一作徐氏，一作费氏。时人还有专著详加考订，以为《宫词》作者非孟蜀花蕊夫人费氏莫属。
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中国文学》卷1“花蕊夫人”条则作如此认定：“世传《花蕊夫人宫词》100多篇，其中确实可靠者90多首。《全唐诗》归属于孟昶妃，但据词中‘法云寺里中元节，又是官家降诞辰’语，中元节为旧历七月十五日，正是王衍生日，而孟昶则生于十一月十四日，可知当出于王建淑妃手笔。”此项判断极是。中元节问题，李调元已引书说及，惟未深究；“确实可靠”云云，或系据浦江清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证》而言。花蕊夫人为淑妃或慧妃，是姐是妹，史籍记述极不一致，两《唐书》、两《五代史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《蜀梣杌》、《五国故事》等书皆然，就连《全五代诗》引注文字也相歧异，但从《宫词》提及“太妃”，应宜确认《宫词》为“太后”作。不过太后为姐为妹，也难定准。此不关涉《宫词》作者宜归属王蜀徐氏、孟蜀费氏的问题，故略而不论<sup>[16]</sup>。
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经《续湘山野录》首布的32首，既是作者手书，应可确认。《全唐诗》（《全五代诗》同）共辑157首，其中已见于王建《宫词》的21首，应剔除。实得136首中，除文莹所见32首外，均系宋明人辑存。此外，孟蜀韦毅《才调集》末卷无名氏37首内有《宫词》三首，见“舜弦”字，也可能系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佚篇<sup>[17]</sup>。现存花蕊夫人《宫词》辑本，以《蜀中名胜记》较早，所录百首又较近实，故笔者借以寻求内证，用助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的认定<sup>[18]</sup>。

花蕊夫人《宫词》关涉皇家人物的诗语,除王衍生辰外,尚有多项足证作者为王蜀徐氏。第65首见“太妃”专称,即诸史所谓翊圣太妃<sup>[19]</sup>。第70首“昭仪侍宴足精神,……依赖识书为录事”的“昭仪”,当是土生波斯姑娘李舜弦;舜弦及其兄李珣均擅撰诗词,著名当世。第12、45、80等首,屡说“御制新翻曲子词”、“唱得新翻御制词”、“新翻酒令著乐章”、“先按君王玉笛声”等等,极合两《五代史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《蜀梼杌》的记载,也多见于王蜀近臣的著作和诗词,倒无史料言及孟昶善于歌曲音乐者。

《宫词》所述蜀宫名“宣华苑”,宫苑内殿堂、亭台、假山、水池的名号,俱属王蜀所定,分别见于史籍和当时人所撰《王氏闻见记》、《玉溪编事》、《北梦琐言》、《野人闲话》等书,如《蜀梼杌》云:“王衍即位之日,即治宣华苑。乾德三年,苑成,延袤十里。有重光、太清、延昌、会真之殿,清和、迎仙之宫,降真、蓬莱、丹霞之亭。……衍数于其中为长夜之饮。”这些建筑的名号和王衍通宵达旦宴乐其间,《宫词》有近三十首提及。孟氏建国,例更王氏宫苑殿堂名,当时资料可见,王氏旧名应不再见于“费氏花蕊《宫词》”。隋朝(或陈朝)所凿摩河池,王建称帝于“武成元年,改摩河池为龙跃池”(《蜀梼杌》)<sup>[20]</sup>(《王氏开国记》)曾说“王衍即位,改龙跃池为宣华池”,可能系有一群大海鸟来居池上以为祥瑞,或者因宣华苑落成而更名。此书似与《王氏见闻记》为同书)。孟蜀建国,改还摩河池原名(苏轼《洞仙歌引》序文所记孟蜀宫尼提说池名即摩河池)。《宫词》里,一见龙跃池名,近二十见龙池名,却不见摩河池名。

王蜀崇道,后蜀奉佛,史有明证。虽然王建对释道无所偏袒,杜光庭赐号传真天师,贯休赐号禅月大师,但王蜀却铸先主铜像立于青城山上清宫,后主曾侍花蕊夫人姐妹朝谒,可见较倾向于道教。《宫词》提说宫苑内有三清台、会仙观、玉清坛、太虚阁等殿堂楼台;第34、39、40、89、90等首,又说宫中以道服为常服,皇帝也时着道装<sup>[21]</sup>。《蜀梼杌》、《十国春秋》、两《五代史》所记述王衍侍母、姨登青城山醮祷王建情况,谓宫人着道服、戴莲花冠,沿山歌舞如云霞里神仙状,徐氏花蕊姐妹诗篇称颂道教神仙者也极多。宋人所录托名宣华苑女鬼的《蜀宫女月夜吟》七绝,第一首云:“旧时衣服尽云霞,不到迎仙不是家。今日楼台浑不识,只余古木记宣华。”<sup>[22]</sup>以提及宣华苑、迎仙宫名,也可佐证王蜀确是以道服为宫中常服。至于《宫词》再四说及宫女入道、宫女奉派日祀老君等等情事,更不合于孟昶、费妃以尼僧随侍。

史传疑王建出西域族裔,永陵出土王建石像及其他人物像后,冯汉骥、吴金鼎、沙利文、德麦玲等中外学者认为可作确证。《宫词》提说宫女组成的皇帝卫队,正是“回鹘衣装回鹘马”;宫中也盛兴传自西域的打马球,且有宫女马球队。此一情况,似只合于王蜀,不合孟蜀<sup>[23]</sup>。

此外,《函海》本《全五代诗》收诗100卷,王蜀最多,计17卷,孟蜀为4卷。《花间集》作者18人,除温庭筠、皇甫松、和凝、张泌非蜀人外,余14人多为王蜀文学侍臣。这种差异,都可能同花蕊夫人姐妹爱好文学并影响王建父子有关。李舜弦兄妹以文学见重于宫廷、后宫,孟蜀无可比拟者。《宫词》有几首记述君臣共读和创作诗词于宫苑,也合乎史籍与其他资料所载王蜀事,孟蜀史事并不涉此。

基于上述《宫词》内证,笔者以为花蕊夫人《宫词》作者定为王建妃,实属确当。

## 注释:

[1]引文据李剑雄、刘德权点校本,中华书局1979年成都版,其他排印标点本断句同此。《词源·修订本》在“浣花”与“遨头”间断句,“遨头”续接“杜子美(甫)……”,略去“故盛于他时”句。《词源》编撰者因而断遨头作太

守,故此,实有误。

[2]坡诗书名,《词源》省称《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之八》,原诗邀头句下有注“[坡]曰: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游,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”,《词源》未引出。笔者据《四部丛刊初编》影印宋本引录,原本坡字用方括号括住,标点系笔者所为。

[3]崔中丞当是崔宁(旰),近人有注作崔光远者,误。崔光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二月为成都尹,当年九月病逝于任所,下距岑参入川五年余。岑参入川系代宗大历元年,其时有《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,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》诗。按:杜鸿渐是年八月始到成都新任西川节度使,次年六月即逃回京城,七月,崔宁(当时仍名旰)继任,后带御史中丞衔。

[4]近人有以为浣花邀头为人日游草堂纪念杜工部者,即举《纪丽谱》和《益部谈资》等书文字,并以杜郊公祠作杜工部祠。但已有作者纠谬,指称人日游草堂习俗,起于何绍基所撰对联,“草堂人日我归来”系何自记,并非杜句。杜郊公即杜惊,元和年间镇蜀。

[5]笮桥在今青羊宫西,亦即杜甫浣花草堂西,净众寺位于浣花溪支流松溪畔。

[6]《四川成都府志》一书,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,我国北京图书馆藏有缩微胶卷,张篷舟《薛涛诗笺》(研究本)影印有“三衢九陌图”,张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。《成都府志》,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曾藏有,不知现藏美国的是否即该书,若各是一本,则华大馆藏之书现在四川大学图书馆。

[7]引文据《丛书集成》本,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。按:近人专著《岑参集校注》收有《冀国夫人歌词》,多方考订诗主为“裴冕妻”,误,笔者所撰《冀国夫人歌词浅说》曾予辨正,拙稿载《华侨日报·文史双周刊》(纽约—香港),署笔名“申及甫”。

[8]吴中复《冀国夫人任氏碑记》为任氏像碑,碑的正面线刻盛装像,碑阴即吴文,原碑在百花潭北岸宝云庵浣花夫人神龛右侧,本世纪六十年代前半期被毁作青羊宫正街煤店铺路石板,宝云庵于八十年代初始全部拆毁。

[9]任氏为濯衣的僧为神僧,其后于云端助任氏破杨子琳妖术,迫使杨只身东逃传说,虽然未被《新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采纳,《旧唐书》却有杨子琳借妖术逃脱性命的记述。两宋之际的著名诗人马偁在《浣花溪》诗中,信有为濯僧衣事,而不信有神僧助战事:“当时濯衣只偶尔,岂似取履张子房。”神僧助阵传说,明人曾据以撰为传奇。本世纪二十年代,荀慧生借以改编为京剧《浣花溪》。百花潭名似不见于杜诗之前,然是否即如吴中夏所说,亦难认定,但任氏平定叛乱即与杜工部离开四川前去湖南同时,则任氏为僧濯衣在杜工部营建浣花溪草堂之前。

[10]杨子琳的叛乱,按正史文字隐约可知系奉代宗旨意,杨战败东逃,先后攻破东川多座州县城池,杀官屠民,并自封夔州刺史,代宗反而“以其本谋近忠”(见两《唐书》),授予峡州刺史(峡州,今宜昌市地区)。

[11]晚唐张为撰《诗人主客图》,其“清奇雅正”一类,以李益为主,苏郁为“上入室”,“入室”有杨巨源、姚合等十人,“升堂”有方干、贾岛等七人,“及门”有朱庆余、于武陵等八人。薛涛列于升堂,全书仅此一女诗人。

[12]“郑”指郑纲,说者定涛诗《送郑眉州》系《送郑资州》,且落实“郑资州”为郑纲,并谓韦皋曾遣郑纲率军赴援陇西,战死前敌。经查薛涛《送郑眉州》一诗,仅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一书题作资州,但原诗首句头四字作“雨暗眉山”,眉州即依眉山得名,资州却因资水得名。郑纲其人,史书无记载,仅见于卢纶、羊士谔诗题。据卢纶生活年代考查,郑纲若果真与薛涛相识,两人年龄也相差三十岁还多。另查两《唐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记载,贞元十七年韦皋在松、维等州攻袭吐蕃入侵军,以及在此前后陇西唐军对吐蕃、回纥联军的多次攻防战,统军将领及死事将领中均不见郑纲其名。

[13]参见《词海》、《词源》等词书“女校书”条文。

[14]请参阅拙稿《薛涛诗笺说》,载《阿坝师专学报》1993年第1期;“孤鸾一世,无福学鸳鸯”,载《大公报》(香港)1988年5月30日,署笔名“申及甫”。

[15]设使强派薛涛作元稹恋人,或作郑纲命妇,以及硬度薛涛为女道士于中年杜门谢客,而伊竟在晚岁伴人玩竹,何得自谓“虚心能自持”?又何能饮誉于《文史通义》、《宏度集·序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等书?1978年秋,辽宁、云南两所大学学报,不约而同地刊文论说薛涛诗篇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,大可参阅。

[16]请参阅郭祝崧:《第一长联与花蕊夫人》,载《大公报》(香港)1980年10月19日。

[17]《全五代诗》辑入韦毅诗,李调元曾加按语并归属韦作:“毅选《才调集》,末卷附以无名氏,而笔有鬼工,自成一家。考之他本皆无,应是己作而附入者。且其诗实出于毅之选,而毅反无传,归之本人,亦以不没其善。”

[18]笔者所据为刘知渐教授点校本,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。

[19]时人专著定中元节为孟知祥生辰(原文作“冥寿”),定孟昶生母李氏为太妃,俱不见于诸史及五代、宋人笔记,不足凭信,而王蜀后主生辰和太妃专称,史籍并五代人所记极多。

[20]《方輿胜览》:“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,因为池。有胡僧见之曰:‘摩诃宫毗罗’。盖梵语呼摩诃为大宫,毗罗为龙,谓此池广大有龙尔。”王建改池名当据此。同书又说:“摩河池一名污池,陈人萧摩诃所开也。”

[21]请参阅拙稿《道服—唐宋妇女时装》,载《大公报》(香港)1992 年 7 月 27 日。

[22]据《邵氏闻见后录》。《成都文类》题作《蜀双竹斋女鬼·二绝句》。

[23]请参阅拙稿《中国古代足球马球运动》,载《大公报·文史丛谈》(香港)1993 年 5 月 4 日。暨远志:《论唐代打马球》,载《敦煌研究》1993 年第 2 期。

(上接第 112 页)

的地震,连绵的战争,或者投掷于广岛上空的原子弹,而在于丝毫未认识到自身未被释放的巨大潜能;在于人们的生活仅仅满足于安全、温饱以及电视连续剧和漫画片对其感官的刺激;在于我们当中有那么多人,从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,或者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,直到生命终止,仍没有获得全面的心理和社会的诞生<sup>[12]</sup>。马斯洛提出人的“自我实现”需要,在分析为什么 90% 的人都不能实现时,认为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,就是缺乏对自我认识的知识,害怕认识自己。越接近个人的知识,人们越害怕。他把这种对个人自身潜力的恐惧和疑虑称为“约那情结”(Jonah Complex)。可见,认识自己,建设自己并不是易事。要使国民心理现代化,首先就应克服人类自身的这一大弱点。心理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就是帮助人们正视自己,认识自己,激发自我建设热情,完成思想、行为和人格的现代化变革,促使自己工作岗位的现代化,全面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!

## 注释:

[1][8][11]苏尔兹著、钟锦泉译《应用心理学》,第 23 页,第 3 页,第 9 页,五洲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[2]L. T. 哈迪著、吴焯译《心理学的现状与未来》,《社会科学动态》1992,第 2 期。

[3]G·墨菲等著、林方等译《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》,第 230 页,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。

[4]卢梭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,第 62 页,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。

[5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4 卷,第 505 页,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。

[6]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 46 卷(上),第 104 页,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。

[7]马克思、恩格斯《共产党宣言》,第 46 页,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。

[9]A·英格尔斯著《人的现代化》,第 22—36 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。

[10]潘菽《论人的实质的自然方面》,《心理学报》1985 年第 1 期。

[12]詹姆斯·卢格《生活心理学》,第 560 页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。